

求情揭示黎智英正是國安案的罪魁禍首

法庭昨日完成處理黎智英等人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求情並擇日判刑，標誌着案件由「釐清事實與定罪」邁入「依法量刑與彰顯公義」的關鍵階段。從與黎智英同案各被告求情陳詞中的「定位」與「割席」清楚可見，黎智英是整個案件的幕後黑手、最終指使者，是不折不扣的罪魁禍首，與法庭長達855頁的判詞所確立的犯罪事實互相印證。黎智英案從定罪到求情，所呈現的事實鏈條與角色分工已十分清晰，既然判詞已確認其首腦地位，求情並不能動搖案件本質，相信法庭將堅定依法對其判處與所犯罪行相匹配、足以警示後人的嚴厲刑罰，切實捍衛國家安全、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

縱觀兩日的求情處理，辯方普遍以「角色較輕」、「只是僱員」、「只按上司指示」、「只負責翻譯或單一版面」、「沒有決策權」等方向求情，力圖把個別被告定位為邊緣參與者或技術執行者。例如，有被告被形容只在「最後階段」加入，僅專注翻譯工作，並未參與核心會議；亦有被告強調自己只是中層職員，無權決策。更有求情指出，被告作為副社長，較少時間參與編採工作，責任較社長少，更曾多次反對黎智英提出的方向，包括黎智英的訪談節目及專欄內容等，以及反對以《蘋果》名義，發起「一人一信」促請美國施壓阻止實施香港國安法，但都不被黎智英接納。

這些說法表面上是爭取輕判，客觀效果卻是把各項串謀罪行的「核心主腦」更集中地指向同一個人——黎智英。當多名被告都以「我非核心、我被動、我不掌權」作為共同辯解時，法庭自然要追問：誰在發號施令？誰定方向？誰掌握資源？誰把媒體平台與外部聯繫串接成一條「國際戰線」？答案呼之欲出。

更重要的是，部分被告在求情中甚至直接點明串謀的主謀結構：有辯方直指「主謀人是黎智英和Mark

Simon」，並以此作為自己量刑起點應接近「情節嚴重」下限，甚至可獲更大幅度扣減的理由。這種說法不僅是法庭量刑時評估「相對罪責」的材料，也從另一角度強化了法庭判詞對黎智英角色的定性——他並非偶然涉案的媒體人，而是「主導和支配的老闆」，在串謀中居於領導地位，具有統籌、指令與推動的作用。若把案件比作一個運作系統，其他人或可被描述為不同齒輪或零件，但驅動系統的引擎與方向盤，則是黎智英。

例如：就黎智英與《蘋果》高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法庭接納前《蘋果》高層供稱，黎智英作為《蘋果》的「舵手」，密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的編採方向，期望員工跟隨其指示行事，他們不能對黎智英說不，猶如「鳥籠自主」；黎智英的政治觀點亦對《蘋果》編採方向有重大影響，社論及論壇文章以其立場為指引，社論作者亦須獲其許可才聘請。針對有否串謀發布的協議，法庭認為，黎智英與高層案發時均知悉文章具煽動性，這些文章與黎的政治觀點一致、亦獲黎的同意，黎批准發布是希望讓「抗爭運動」持續，須從黎的政治立場解讀涉案文章，並進一步裁定，黎是利用《蘋果》實現其反中國的議程。

求情內容同樣顯示，部分認罪被告以「早認罪」、「作供」、「提供口供」、「協助警方」，甚至「超級告密者」級別為理由，爭取按法律原則獲得刑期扣減。法庭如何具體接納，有待判刑理由交代。但無論刑期扣減幅度多少，此類求情的核心邏輯仍是：他們之所以認為值得較大減刑，是因為他們提供資料揭示更高層、更核心、更具主導性的角色與行為。換言之，他們的「協助」本身，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串謀有主腦、有核心、有主線，這些毫無疑問都是指向同一個人——黎智英。

文匯社評

WEN WEI EDITORIAL

善用人工智能 促進教學造福社會

現時世界不斷在人工智能(AI)領域進行探索和嘗試。特區政府與本港教育界也正積極應用人工智能，以提升教學質素，貼合時代需求。團結香港基金調查顯示，當前香港教學過程運用AI普及率超過九成，但同時亦衍生出學生對AI形成依賴的問題。23%受訪學生直言若缺乏AI協助，將難以完成課業，而有信心獨立完成學習任務的亦只得39%，應用人工智能促進社會各方面發展乃大勢所趨，不應因為存有瑕疵而否定。在人工智能應用尚未成熟的階段中，各界應作出必要的管控規範，尤其在教學領域要提供清晰指引，以利正確學習、使用人工智能，造福社會。

現時教師在教學和行政等方面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學生在搜集資料、完成作業方面也多用到人工智能進行輔助。不過，使用人工智能教學亦衍生一些問題，例如教師對應用人工智能的自信程度比不上學生，也有教師關注以人工智能進行學習會削弱學生的解難能力、批判思維、創意、記憶力等，有不少學生甚至認同「若無AI協助，難以完成功課」。

類似情況在互聯網初普及時也出現過，當時教育界也曾擔心，學生太依賴網上準確性不一的資料，養成疏於求證的懶惰習慣，也有人憂慮會增加抄襲、剽竊等不良行為。經過多年實踐，互聯網學習對人們利大於弊，

防止剽竊和假資料傳播的技術也日益成熟。教育界和社會人士的及時提醒與反思，對互聯網在學習應用上起到了正確引導作用。

人工智能為師生帶來便利，各界應該順勢而為，持續引導下一代熟習應用人工智能，促進社會創新與經濟發展。至於人工智能衍生的問題，則可透過積累經驗、完善規則以填補不足。例如，學童廣泛應用人工智能搜集資料和製作圖表模型、設計美術作品，效果比過往好得多，由意念到成果展現，所費時間縮短不少，應予以鼓勵。不過，學生撰寫文章，是語文運用、思考和溝通的訓練，運用人工智能「代勞」，的確會令他們失去鍛煉的機會。學校要定下規矩，要求學生在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情況下完成該部分作業。近年已有判別人工智能撰寫文章的軟件推出市面，校方可以善加利用，監測學生有沒有作弊。

如何將人工智能用於正途，以更有效手段防範人工智能被濫用，是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最近，社交媒體「X」旗下的「Grok」人工智能平台被人用作生成和散播色情內容，引起廣泛關注，有部分國家啟動調查甚至封禁，有關「人工智能發展是造福還是危害人類」的討論再度引起熱議。社會各界可從人工智能合法合規發展的角度，探討如何從法律、道德的層面予以規範，讓人工智能始終在正確的軌道發展，使人類生活更多姿多彩。

諾獎英雄港科大開講 以親身有趣故事講述科研突破靈感源於生活 垃圾桶拾出石墨烯

香港正全力打造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及創科中心，頂尖學術活動接連登場：繼前日香港大學舉辦「諾貝爾英雄論壇」後，香港科技大學昨日亦迎來「諾貝爾英雄@科大」交流盛會，匯聚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分享其科研路上的心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史柳藝

▶港科大昨日迎來「諾貝爾英雄@科大」交流盛會，匯聚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分享其科研路上的心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左起：諾沃肖諾夫、莫頓、格納羅及亨特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在羅寶文的主持下，四位「諾貝爾英雄」分享了他們在科研世界的有趣經歷。2001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亨特指，發現控制細胞分裂時序的周期蛋白竟源於壽司店的海膽。在觀察細胞分裂時，他意識到「這裏面存在一個『時鐘』，我正在見證它的運轉。」他想了解卵子受精後的合成新蛋白質之啟動過程，進展卻不順利，但最終在海膽的卵子中發現了一種周期性積聚並於細胞周期中途被降解的蛋白質，命名為周期素(cyclin)。

這種蛋白質在調節細胞周期中起關鍵作用，相關研究能增進科學界對人體腫瘤生長的了解。他更笑言，「有人說，獲得諾貝爾獎的最佳方式，就是做一件理論上不可能的事。我妻子總調侃我說，既然我都能拿諾貝爾獎，那任何人都可以！」

「一根煙」解動脈鬆張機制

找到一氧化氮作為心血管系統中信號分子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格納羅，年輕時經常賽車，知道汽車廢氣含一氧化氮，卻很喜歡那種氣味。團隊在研究血管時，有研究員在實驗室抽煙，「他叼着一根煙走進來，煙霧瀰漫整個動脈樣本，結果所有動脈都鬆弛了」。起初他以為動脈壞死，卻發現「動脈重新有了張力，完全恢復正常」，說明香煙煙霧能引發動脈可逆性鬆弛。之後他們做了更多實驗，在查閱資料後得知「香煙煙霧中含有百萬分之八百的一氧化氮」，進而解開其鬆弛擴張動脈的機制。

研究初期，他遇上不少困難，申請經費被拒，把論文投去國際著名的學術期刊，也吃了閉門羹，被告知其研究「不可能成立」，後來他將論文發表在另一本期刊上，成果獲同行重視，並獲得十年經費資助。

此外，他對一氧化氮的認識，更影響了舉世聞名的威爾鋼能順利面世，「有泌尿科醫生問我，是否知道影響陰莖功能的神經會釋放何種神經遞質。我查閱了文獻，並受到好友的啟

發，推測一氧化氮可能就是那種未知的神經遞質，實驗最終證實了這一點。不過我的實驗室規模很小，無法開發藥物。」因此，有些人稱他為「威爾鋼之父」，他笑言：「我一點也不介意，但母親每次聽到這個稱呼都會非常不高興。」在威爾鋼上市數月後，他獲得諾貝爾獎，「當時心想，兩者是否有關聯，後發現諾獎委員均為60歲以上男性。」

至於經濟學獎得主莫頓，他的模型被銀行與投資公司廣泛應用於產品定價及市場風險對沖，覆蓋抵押貸款等各類金融產品，已成為行業標準。他指「衍生性商品是非線性的，風險會不斷變化，不能用簡單回歸分析，需要用專門定價方法。」這一理論可以「量身訂製」金融產品解決特定風險收益問題，催生了龐大行業，「且50年後的今天仍然有效」。

物理學獎得主諾沃肖諾夫則分享了與同事用透明膠帶分離石墨烯的故事，「我沒把研究看得太嚴肅，大部分時間都在玩耍。我們研究過像蜘蛛俠一樣攀爬牆壁的『壁虎膠帶』、磁性水等有趣的小實驗，石墨烯的發現也是如此。」

團隊想用石墨烯製作電晶體，有人用拋光機打磨石墨以減薄樣本，結果忙活一周只拿回一堆粉末。後來他發現這類實驗的樣本表面通常會用透明膠帶剝離，而人們用完膠帶後都會直接丟棄，他從垃圾桶裏撿起了這卷膠帶，半小時內就做出了第一個石墨烯電晶體。

「當時我們在碳材料領域是無名小卒，沒人知道我們的研究，但我們發表了論文，證明可以製造出單層碳原子結構，也就是強度極高、性質穩定的石墨烯。」由於石墨烯又薄又輕，潛在應用範圍遍及醫學、運輸、科技產品，甚至避孕套，影響力驚人。

原來，科學泰斗都會面對寂寂無聞的失意，他們的故事或許都有共同的主線：「好奇心與堅持相遇」，這啟示着後來者，突破性的發現往往始於生活中一個微弱的靈感，透過不懈的努力，才有收穫驚天動地的科研成果。



葉玉如：教育是一場充滿活力的對話

昨日「諾貝爾英雄@科大」活動，主禮的港科大校長葉玉如對四名諾貝爾獎得主到來，正是科大「探索求知、影響深遠」精神的體現，而他們的成就亦證明了「跨學科、跨國界的合作，對於應對人類重大挑戰至關重要」。

她強調：「教育從非單向的知識傳輸，而是一場充滿活力的對話——它拓展想像力，重塑我們的既有認知。」

葉玉如又提到，港科大正邁入3.0發展階段，將透過

「無用」研究或開啟新領域改變世界

昨日「諾貝爾英雄@科大」活動，各諾獎得主亦積極回應在場港科大師生的踴躍提問，分享其真知灼見。

有碩士生提到，在知識探求的路上，很多時會遇到諸多「看似無用」的研究，應如何自處。諾沃肖諾夫強調，一些現在看起來無用的研究，往往會對全球產生最大的影響，「因為它們有機會開闢全新的應用方向，那些你目前無法預見的方向。如果你能預見到某些應用，說明它只是對現有體系的微小改進。但如果沒有直接可見的應用，就意味着它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會開啟一個全新的前沿領域，帶來典範變革。」

莫頓：好奇是解決問題驅動力

莫頓亦表示，理解部分年輕研究人員會擔心正從事的研究「無用」，他分享其自身經驗指，「我做研究的動力是，相信如果我解決了這個問題，對事情總會是有幫助的。」他笑着補充，撇除顧慮所做的研究是否「有用」，自己對解決問題本身也是充滿好奇。

針對港科大師生問及如何克服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

難，格納羅分享，其早年有關血管擴張劑的發現，始終未獲認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不給資助，期刊也質疑。我只好用自己和母親的錢繼續研究，最終才發表了論文。」他寄語港科大師生，職業生涯初期難免會有很多磨難，但關鍵是永不放棄，自己亦有透過體育運動，學習這種堅持的精神。

而被問及人工智能(AI)對學術研究的衝擊，莫頓認為，AI有助更快地完成那些我們並不真正喜歡做的工作，「你可能充滿好奇心，但總會遇到一堆自己不感興趣卻必須做的工作。用我妻子的話說，它不算是人工『智能』，而只是輔助性資訊工具。幫你做不想做的事，而非取代你想做的事。」

他認為，部分工作或會因AI消失，但AI更多是協作工具，建議大家用常識來看待AI，「經濟學教給我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競爭，現在AI領域競爭也白熱化，你的競爭對手，就是行業的前沿者。」他又提醒，雖然AI在金融大數據處理上極具價值，但千萬別幻想太多，以為靠AI在市場大賺一筆，有金融高回報領域，對手始終是「擁有巨額資源、能購置所有設備的主權財富基金等機構」。

成立香港第三所醫學院，整合臨床卓越與技術創新，塑造醫學未來，並鼓勵參與是次交流的師生「勇於提問、汲取靈感」，共同以科學創新開創更美好的明天。

今年迎來75周年的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執行董事尼古拉·特納提到，大會與港科大同樣迎來重要的周年紀念，並強調港科大在培育年輕科學家方面地位獨特，亦重申本次論壇的舉辦意義深遠。「我們正身處於一個龐大的社群與『大家庭』中共同慶祝」，他同時鼓勵現場師生與學者「勇敢提問」。